

〈特集〉

演讲记录

网络时代的文化遗产及其挑战 ——海峡两岸亚文化冲突的反思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 刘 国深

东亚地区是一个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圈，作为东亚文化的两大主要载体，中华文化和日本文化有着1000多年的交流交往历史。在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没有电子媒体，甚至没有发达的纸质媒体的唐宋以及后来的元、明、清时代，中华文化依然东渐日本，成为当今日本文化的构成要件（如儒家文化和汉字东传日本）。时移势转，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文化创新与发展也对中国近现代文化变迁产生深刻影响，日本文化对当代中华文化的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如清末的变法图强运动和日语汉字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影响）。历史上东亚文化在东亚各国之间的传承与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虽然有如涓涓细流，却是旷日持久、日积月累，总体上呈现出一个交融互鉴、相得益彰的历史画卷。

当前，世界各国已进入互联网时代，文化传播的工具已非现代化的飞机轮船可以比拟，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传播速度已进入“秒传”时代，山高水远也不能阻隔跨文化的共时性。东亚各国人民可以同步接收同一新闻事件，青少年可以在网上进行跨国电子游戏竞赛，大学教授可以借助互联网进行即时的跨国研讨文化交流……甚至离开互联网我们已难以正常生活。然而，网络时代各国内部和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遗产与发展，绝对不仅只有畅快的速度和海量的信息，一场不知不觉的挑战正在降临之中：网络文化的快捷和极简化正在让人们疏远于逻辑思维和理性思考，各国正在陷入误解与情绪化冲突易燃易爆阶段。

一、网络时代的“去权威化”趋势

人类的知识是非常有限的。在知识爆炸的网络时代，人类个体的知识变得更加渺小。著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教授说过：我们人类的肉眼能看到的宇宙万物仅仅其中的4%；另外还有23%的物质虽然肉眼看不见，但现代科学仪器已经可以发现并测量它们的存在。但是，仍然有73%的宇宙物质明明存在着，人类至今无法感知和测量它们的存在。近年来量子通讯的话题引发中国舆论界热议，“隔空传物”竟然从神化变成现实。随着更多量子科学技术被“翻译”成普通人的知识，我们对这个世界感到更加震惊，我们不得不对专业知识和未知世界保持更大的谦卑和敬畏之心。虽然受惠于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人获得了博士学位，但相对于海量的网络信息，博士们的知识储备更显“只专不博”。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超出自己的专业，基本上没有评价是非曲直的能力，对于专业以外的社会事务基本上只能跟着媒体“随波逐流”。

互联网+媒体所打造的网络平台已经是我们获得新信息和知识的主要途径，互联网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想躲也躲不掉。我们身边的不少人家家里已不装市内电话，连电视机都不装，基本上不看纸质媒体，他们天天拿着手机看新闻。的确，没有比手机上网获取知识更方便的途径了，我们家中的台式电脑也越来越陷入“闲置”状态。今天的中国城市可以说是：手机在握，什么都有。从小学生到九旬老人，都成为通过手机互联网与外面世界进行联系的人群，人们获取新知识的途径越来越多依赖于网络。这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文化现象，透过网络进行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方式，必将成为跨越时代的潮流。

文化传播手段的飞速发展，必然使各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海量知识来袭的巨大压力，无论多么知名的专家、学者、教授，他们个体的知识储备和传播能力在互联网面前都显得沧海一粟。其结果，过去的文化权威光环不再，文化的“去中心化”不可避免，连带引发各领域的“去权威化”趋势。而100多年前就已遭受过一次西方文化冲击的东亚文化圈，又将如何应对互联网时代圈外文化的挑战？东亚传统文化的传承过程历经千年，内容相对有限和单一，是非优劣易于评判；网络时代的文化传播不仅是巨量的，而且是碎片化的。面对典范的消失，普罗大众如何进行价值规范的取舍？是放任自

流还是建立规范、趋利避害？对于东亚各国来说都将是艰难的选择。

二、网络时代文化传承的问题

在20世纪之前，全世界的学科分类还是比较有限的，人类社会的知识相对容易为少数文人学者所驾驭，知识体系的传承相对系统和完整。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东亚文化传承在内容方面更容易定于一尊，人们的认知、情感和价值取向相对来说是比较相似的。20世纪以来，学科分类越来越多，各学科的知识体量也急剧膨胀，文人学者越来越分科化、专业化，隔行如隔山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进入网络时代以后，知识大爆炸已到了“核爆”的级别，互联网上各种信息和知识呈“短平快”之势在喷发，结果是良莠不齐，“泥沙俱下”，教师等专业的文化传承工作者在文化传承中的角色重要性正在持续下降。很多新闻报导揭露，大学课堂中教授在卖力授课，台下的学生们却在网络中流连忘返。

由于信息更新的速度飞快，网络时代的文化传播走向快餐化、浅碟化、娱乐化，网络文化趋于高度简化和具像化。网络世界提供的文化信息充斥着表象化、极端化、娱乐化的文化产品，许多内容往往经不起事实、理性和逻辑的检验，用“视觉爆炸”、“标题党抓眼球”、“腥膻色当道”来形容当前的网络文化样面貌并不为过。去规则化、去标准化和“无厘头文化”竟然成为新的时尚。在商业规则的驱动下，低制作成本的文化产品更易于行销，商品的包装比产品的实际内容更重要，就像中国大陆市场中低价的掺假蚕丝被挤垮高价的手工蚕丝被一样，纯正与否并不重要了。当前的文化知识传承为了适应网络文化传播的法则，必须采取短小精干的方式进行行销，这样更容易得到网络受众的喜爱，往往越是稀奇古怪、越是耸人听闻的文化产品就越是卖点。而真正建立在深入、系统、全面、辩证的分析基础上的研究，已越来越难以被网络受众青睐，长篇大论的学术文章不仅非专业人士不愿看，即使同一专业领域的学者之间也很少有人认真研究同行的专业研究论文。

文化快餐化的结果是，所有的文化知识正在被简化、碎片化，人们的知识将越来越多由碎片化的知识片断所构成。在战争和敌对环境下，“短平快”的知识和信息有利于快速动员和有效执行，其结果就是成王败寇，民众付出的代价将极其惨重。在和平与合作的时代环境下，知识和信息的过度简化不

仅不利于包容与协作，而且由于不求甚解而难以解决复杂的问题，更有可能因为误解使和平与合作的进程突然中断。在多元文化的冲击和文化碎片化的打击下，当前我们已真真切切面临着网络时代的严峻挑战，传统的知识体系、话语体系、政治社会化途径、社会治理方式等等，都将面临挑战。伴随着各国之间的经济、社会融合发展进程，加上新媒体技术的运用，一个全新的表相化和碎片化的跨文化体系正在形成，既有的国内（境内）文化结构面临新的挑战。

三、网络时代的海峡两岸亚文化冲突

网络文化的负面影响正在海峡两岸中国社会蔓延开来。媒体人是网络文化传播最主要中介，两岸媒体人的网络文化角色非常重要，关系到海峡两岸的前途命运。问题是，媒体人和互联网要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精神食粮？网络文化将把海峡两岸带往何方？过去，新闻记者是社会的精英阶层，仍然有“媒体是台湾社会的最大乱源”的说法。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媒体从业人员没有准入门槛，网络社会将更加混乱。最近中国南部某特别行政区陷入“动乱”，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媒体缺乏社会责任。据说当地的记者证只要一份学生证复印件和几十元就可以办出来，这些所谓的“记者”正在乱世中推波助澜。有一种新流行说法：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自媒体，这一说法已足以颠覆人们对媒体行业神圣性的认知，而那些拿着几十元就可以换来的媒体专业人员证书的“记者”，很难让人相信会生产出够专业的资讯。

在媒体早已成为“无冕之王”的台湾，社会大众更难获得权威性的信息。2000年，在观察和研究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台湾社会充斥着各种似是而非的现象。有那么多“见庙就拜”，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政治人物，虚假资讯层出不穷……我在一次演讲中有感而发：台湾的新闻真实未必是政治真实，台湾的政治真实未必是社会真实，台湾的社会真实未必是人心的真实，今天的台湾人心真实未必是明天台湾人的人心真实……2020年以后，这种情况好转了吗？没有，进入互联网时代后，虚假的信息只有更多没有更少。我相信在座的两岸的媒体朋友们都无心做假新闻，但是，各位只凭善良的愿望就可以告诉受众吗？我们除了将自己听到、看到的政治和社会现象准确地“复印”“影印”给受众外，能否进一步帮助受众

更加清晰准确地了解现象背后的本质呢？

再以台湾地区盛行多年的“民意调查”新闻资讯为例，当复杂问题被简单化处理后，精确的科学计算只能是进一步放大错误的信息。用量化统计的手段研究人们的政治行为倾向，本来是社会科学化的一种努力，可以朝这个方向努力，但不能滥用，更不能故意误导。行内人都知道，民意调查有很多局限性，什么时候问、问谁、谁来问、怎么问，结果都会不一样。在两岸关系问题上，有更多复杂的政治问题被所谓的“民意调查”和网络文化高度简化了。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中的问题大多有多个面向的样貌，而且表象之下的实质不易察觉。如果媒体从业人员缺乏对问题的专业理解，他们的传播只能在这些可能被计算机简化和极端化的结论基础上再进行放大传播，这样的网络文化对于两岸分歧的化解没有帮助，反而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对于民众素质的提升不仅没有帮助而且有害。市场导向的网络文化很难接受冷静理性的专业意见，往往是哗众取宠的极端化言论更易于受到追捧。

回顾近10年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历程，我们一次次看到网络文化在两岸关系重大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就往往经不起一个网络事件的冲击，例如：2013年12月的“张悬事件”、2016年1月的“周子瑜事件”、2017年的“刘乐妍风波”、2018年的“九二面包风波”和2019年的“欧阳娜娜事件”、“台湾水果茶风波”等等，一次次的网络新闻事件都被有心人士“火中取栗”，激化两岸民间情绪对立，最后由全民为冲突对立买单。2014年台湾地区的“反服贸运动”、2016年1月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和民意代表选举、当前的两岸紧张对立态势，无不与激情的网络事件密切相关。网络时代已是既成的事实，两岸关系研究工作者只有顺应这个时代趋势，反求诸己。笔者担心的是，海峡两岸网络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否也会在东亚其他国家出现，甚至影响到东亚国家间的文化传播。

四、网络时代文化传承的出路

与其他文化相比较，网络时代的政治文化传承面临的挑战更加急迫。由于政治文化传播主体多元化，政治社会结构必然走向碎片化，政治权威可能走向崩解。东亚国家要时刻警惕出现社会失序状态，一旦政治上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实行有效的治理，政治和社会秩序将荡然无存。比较一下中国大

陆和台湾地区的发展历程，我认为中国大陆这40年的安定团结才是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的秘诀；而盲目追求被扭曲的民主、自由则是台湾地区相对衰败的根源。当前中国南部某个特别行政区出现的问题，正是过度的文化多元化造成的结果，那里的一切权威正在受到挑战。如果过度强调局部和个人需要，缺乏整体和国家的意识，这样的社会是不会有希望的。

注重儒家伦理和家族社会关系的东亚文化还是需要强调集体意识和社会责任的，否则社会秩序一定瓦解。有社会责任的媒体除了满足受众的需求，还要承担教化责任，引导社会大众追求社会公共利益。台湾地区在过去的30多年来，在所谓的民主、自由口号之下，越来越“碎片化”，台湾已难再成就什么大业了。多年前台湾社会流传过的话：“台湾社会有两大乱源：一是立委、一是媒体”，作为一位长年从事台湾问题研究的专业人员，我认为这话说得够狠够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诚如台湾政坛某一位大老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演讲时所说的：搞垮中国大陆，不需要千军万马，只要把台湾的选举和“新闻自由”搬过来就好，三个月就垮了、乱了。

话说回来，网络时代的文化传承机会与挑战并存，注重理性和逻辑分析的专业研究人员和文化传播者还必须学会网络时代的行销策略，如何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通俗、易懂、抓眼球的方式，运用网络平台推销出去。

而东亚文化在面对全球化网络时代挑战时，自身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势的再现代化问题是值得认真思考的，今天的东亚文化究竟还有哪些值得传承和发展的文化价值和表现形式，这个问题有待专业的东亚文化研究者去回答。

(2020年9月修改)